

“超级中学”现象演化的制度逻辑

——以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黄冈中学为例

田汉族 王 东 蒋建华

【摘 要】“超级中学”现象是近年来在普通高中教育领域出现的、备受公众关注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教育现象。“超级中学”现象演化具有多重制度逻辑：国家对高中政策的导向及其治理方式、地方政府对教育政绩的追求、学校对生存危机的积极面对和对教育品牌的主动追求、家长和学生对优质教育的迫切需求和对升学的强烈渴望是其共同作用的结果。如何有效治理“超级中学”，要在科学认识、准确判断这种现象的基础上，谨慎地做出制度安排，以创新精神、法治思维深化高中教育改革；尊重办学自主权，促进普通高中特色发展；加强对超级中学舆情研判和引导。

【关键词】超级中学；制度逻辑；治理

【作者简介】田汉族，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教授；王东，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蒋建华，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北京 100048）。

【原文出处】摘自《教育与经济》（武汉），2016.5.3～11

【基金项目】本文是教育部政策法规司2015年委托课题“特色高中现象研究”研究成果。

近年来，河北衡水中学、安徽毛坦厂中学等“超级中学”，因每年取得优异的高考成绩而频频进入公众视野。一些媒体和专家指责超级中学将学生训练成考试机器，把应试教育发挥到极致，掐尖破坏了地区的教育生态；考生和家长面对舆论批评选择了沉默，并一如既往地向往这些学校；同类学校络绎不绝地到这些学校取经；地方政府依旧对超级中学关爱有加。“超级中学”，到底是高中教育发展的“行业标杆”，还是应试教育极致化的“标本”？为了弄清超级中学现象的“事实”，整体把握这类普通高中的改革与发展特征，课题组于2015年5月-7月先后赴黄冈中学、毛坦厂中学、衡水中学进行调研。本文试图结合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对“超级中学”现象进行制度逻辑分析，并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一、“超级中学”现象之争

（一）学术界的三种观点

1. 批评观点

对“超级中学”持批评观点者包括高校、研究机

构的专家教授，也包括从事新闻工作的记者、评论员，他们主要从高中教育的目的、教育公平、学校管理来审视超级中学现象，严厉批评这类学校：（1）垄断优质资源，损害教育公平^[1]，“造成了地区高中发展的马太效应”^[2]，破坏区域教育生态^[3]；（2）题海战术，让学生麻木，扼杀创造力，不利于学生持续发展；（3）军事化管理，压抑学生个性；（4）“不是一所正常的学校”。^[4]

2. “中立”观点

秉承“价值中立”立场者很少用“是非对错”的标准去评判单个学校的好坏，他们更多的工作是探讨超级中学形成的社会原因，对这种现象进行“合理化”解释：（1）“超级中学”现象是以追求升学率为目标的教育评价制度产物，是地方政府片面追求教育政绩观的结果。在现行教育制度下，政府对学校的评价、民众用脚投票的依据其实主要是“高考成绩”。不追求升学率的高中绝对不是一所“好高中”。只要高考制度不改，超级中学就会存在。（2）“高考神话”

是高学历消费现象的体现。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与复读之间存在这样一个逻辑关系:社会经济发展增速放缓——就业门槛提高——大学生就业难——用人单位和学生追逐名校——复读热。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等高中成为“复读生蓄水池”,使这类高中高考神话的不断被复制具有可能性。(3)“高考工厂”是人们对升学确定性的追求。“高考工厂”给充满不确定性的“高考”平添了几分确定性,只要严格遵照“工厂”的操作流程和规定,学生就会成为预期的“产品”(名校学生)。(4)“超级中学”现象体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真理。超级中学一般出现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三四线城市,与东南沿海和发达城市相比,这里的人们对“知识改变命运”深信不疑,从而助长了以升学为目的的高中存在。

3. 肯定观点

在学术界还存在为“超级中学”现象“点赞”的声音,尽管这种声音相对微弱。研究者主要从家长、学生、教师、校长的感受和收益角度来实证。如大规模高中“使更多的学生享受到优质高中教育资源”、“提高了办学效益”、“扩大了教育公平”;增加了学生的选择性,促进了教师的专业性^[5]。“衡水中学是一所追求卓越的学校”,指责衡水中学为学生“洗脑”和把学校办成了“高考集中营”有失公允^[6];“不要再妖魔化衡水中学”^[7];“我们今天要思考的不只是衡水中学做错了什么,而是衡水中学有没有被妖魔化,有没有被媒体的选择性描述所遮蔽的东西。”^[8]

(二)媒体“炒作”的焦点

在学术界对“超级中学”现象的争论中,“批评之声”居于主流地位。在这种舆论氛围中,大众传媒倾向于关注这类学校的负面新闻,借助“以点带面”、“以小见大”的方式去质疑这类学校的价值。

1. 对学生高压管理,导致高风险事件

超级中学对学生的高压管理,容易带来高风险事件,如学生“跳楼自杀”、学校乱收费行为。这类事件放大了学校管理的弊端,往往成为新闻的热点,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超级中学的负面形象。

2. 掐尖优秀生源,笼络高分复读生

“生源问题”经常成为媒体质疑超级中学高考成绩的理由。一方面,这类高中实施“掐尖”,网罗省内

部分优秀生源;另一方面,这类高中举办“复读班”,吸收大量优质高考落榜生源。为了规避政策限制,毛坦厂中学通过举办“金安中学”、衡水中学通过举办“衡水第一中学”的方式实施跨区招生(掐尖);将高考分数作为复读生招生主要标准,分数高的复读生不收费,甚至要倒贴(发奖学金),从而吸引了不少优秀高中毕业生。

3. 破坏教育生态,导致教育失序

有媒体指出,“超级中学”现象是教育锦标主义的结果。围绕高考,各高中的竞争白热化。笼罩在“亚洲最大高考工厂”的毛坦厂中学、衡水中学上空的硝烟还未散尽,另有一些类似高中不断被媒体曝光。据报道,江西省上饶市广丰中学近年来通过高价“购买”已考上大学的优质复读生源,来冲击来年的高考“状元”,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并由此形成了一条稳定的“复读利益链”。“高考工厂”、“复读利益链”的存在,加剧了应试教育,严重影响当地教育生态的平衡。^[9]

4. 高考成就被视为“神话”,学校充满神秘色彩

黄冈中学、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的高考成就在媒体中经常被视为“神话”,给超级中学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不少前去黄冈中学、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参观的学生、家长、其他学校的教师都带有一种“朝圣”的心理。毛坦厂中学校门外的窄巷中有一棵“神树”,每逢高考前夕的农历初一或十五,都会有成千家长前往烧香跪拜。在取得高考神话般的成就后,人们对这类高中产生了诸多非理性的“迷信”行为,学校形象被媒体进一步“丑化”。

(三)超级中学的反驳、辩护

面对学术界、媒体的批评和指责,这些“超级中学”从未予以承认,大多采取回避或沉默,但也有学校通过各种渠道、以多种方式对批评和指责予以反驳,认为这些报道失真,并主动利用师生、家长现身说法,维护学校声誉。衡水中学甚至将各种有影响的评价直接挂在学校网页上,让人们自由评说。他们的基本观点是:

1. 学校追求的不是高考升学率,而是高考质量

伴随着高考升学率的稳定,传统的升学率、高考状元等指标已经不能充分体现其高考成就了,这类

学校又创造出多种指标彰显其成绩。如近年来,黄冈中学极力宣传学生在国内外竞赛中获奖情况;衡水中学使用“北大清华升学率”、“提档线排名前十位高校录取人数”、“‘985’高校升学率”、“‘211’高校升学率”等指标,这些高考成绩指标表明超级中学的教育目标不是一味的“升学率”。

2. 学校获得的“高考成就”,是其自身办学过程的副产品

他们提出高考成绩只是自身办学过程的副产品。这些学校的学生、教师在国内外的各种大赛中都获得了骄人成绩,学校举办各种区域性甚至全国性的教育教学思想讨论会,学校的校长也成为业内公认的专家。如衡中的张文茂校长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被聘为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中心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等。

3. 学校实施的是真正的素质教育,素质教育更能提高升学率

针对“应试教育”的指责,黄冈中学、衡水中学都予以否认,并且有意打破“应试教育与高升学率”之间的单一因果逻辑。《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也曾发表多篇文章,强调素质教育与高考升学率并不矛盾,反而能提高升学率的观点^[10]。在总结办学经验时,衡水中学老校长李金池坦诚曾走过“应试教育”的老路,但是从1995年便开始扭转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思想 and 作法,把学校工作重点转变到如何改革课堂教学和学校的整体教育工作,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等方面。他们认为,正是素质教育保障了其高考成就。

总之,多维度的和反思型的讨论有助于引发教育界和全社会反思如何推动高中教育深层次改革,如何促进高中教育健康发展,这也正是讨论的价值所在。从这些超级中学的实际功能看,已经远远超越原有的学校教育功能,成为与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紧密相连的一种复杂的教育现象和社会现象。超级中学就像多棱镜,以上评价只是反映了某一面。显然,简单地批判或者赞扬都不合理,需要进行深入分析。

二、“超级中学”现象演化的多重制度逻辑

制度分析是将组织置于制度逻辑中加以解释,是组织分析理论的主要方法。“制度逻辑”对制度变

迁、制度创新,尤其是制度冲突或制度失败解释较为适用。^[11]“制度变迁是由占据不同利益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相互作用而推动和约束的,而不同群体和个人的行为受其所处场域的制度逻辑制约。”“需要在多重制度逻辑的相互关系中认识它们的各自角色。”^[12]“超级中学”现象是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发生的高中教育制度诱致性变迁,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学校相互作用的结果,政府规制、市场渗透、学校组织适应与创新等多种制度逻辑在其中综合地发挥作用:学校发展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相互支持、互为因果关系;学校发展与政府连接在一起,双方形成一荣俱荣的局面;“上大学改变命运”的文化心理与名校升学效应相互作用,“超级中学”现象不断强化“读书有用论”的价值观念;校长和学校的知名度相互影响;媒体和学校的舆论宣传相互呼应。因此,对“超级中学”现象进行制度逻辑分析,有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中国教育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 政治逻辑:重点学校制度、效率优先取向的政策效应

政治逻辑即政府通过政策导向、制度安排来治理高中的观念和行方式。高中教育改革与发展是在国家政策框架下进行的。我国高中政策主要经历了重点发展、数量发展、多样化发展几个阶段。超级中学在不同时期都享受到了政策的支持。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高中教育的基本政策思路是办好重点中学或示范高中。示范性高中基本上延续了重点中学的发展思路,体现了“重点保证、优势扶持”的政策取向。重点高中、示范性高中获得了优先投入、优先发展权。而保送生、加分政策也使这些学校占据有利地位。

从下页表1不难看出,三所超级中学是国家重点中学制度的直接催生的结果。这些中学一般拥有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如自主招聘教师,自主进行工资改革、课程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由政府划地,异地新建分校等。如为确保在2000年以前衡水中学首批进入示范类高中的行列,在衡水市年财政收入不到2个亿的情况下,市委书记提出1996年-1998年,分三年拨1200万给衡中。可见,地方政府对学校支持力度



表1 三所高中确定为重点或示范中学的时间

学校名称 建制时间	黄冈中学	衡水中学	毛坦厂中学
建校时间	1904年	1951年	1939年
确定为省 重点中学的时间	1953年 (湖北省首批)	1962年(河北省10 所重点中学之一)	
恢复为省 重点中学的时间	1978年 (湖北省首批)	1978年 (河北省首批)	
确定为省示范性 高中时间	1993年 (湖北省首批)	1998年 (河北省首批)	1999年(六安市); 2001年(安徽省)

资料来源：黄冈中学官网[EB/OL].<http://www.hbshgzs.com/Article/rshg/xxjj/Index.html>,2016-10-11;河北衡水中学官网[EB/OL].http://www.hbhzz.net/Article_Class2.asp?ClassID=36,2016-10-11;六安市毛坦厂中学官网[EB/OL].<http://www.lamtc.com.cn/detail.aspx?id=3228>,2016-10-11.

之大。优先投资重点中学体现了地方政府教育投资决策的效率意识,客观上维持了重点中学的优先发展权,奠定了其发展的物质基础,保障了超级中学持续发展。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特别是义务教育的普及、高校扩招,我国制订了加快普及高中教育的政策。超级中学办学规模大的特征主要是政府扩大高中发展规模的政策导致的。

2010年以来,教育公平问题受到普遍关注,在普及同时提高普通高中教育质量等相关政策出台。在这种背景下,超级中学的规模、违规收费、学生负担过重等问题开始受到政府干预。

总之,“超级中学”现象体现了中央政府高中教育政策的实施效果,也体现了地方政府的政绩观。地方政府是超级中学现象的推动者和维护者。这些地方领导都以辖区内拥有“超级中学”为荣。西部欠发达地区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但“超级中学”现象却很突出,主要原因是“超级中学”能给政府撑面子。由于它能代表政府形象,有的教育行政部门甚至给中学校长下达升学率指标,完不成指标就一票否决。尽管中学规模过大,会带来安全与卫生隐患、经济和管理风险,媒体报道过,地方政府官员也都知道,但他们只是缺乏改变的内在动力。

(二)市场逻辑:基于消费者需求和高中财政压力的市场机制渗透

市场观念被广泛认同是超级中学现象产生的经济基础。随着政府对高中教育投入的减少,学校不得不面向市场筹集经费,并运用市场机制来经营学

校。超级中学现象,与其说是政府放松管制造成的,不如说是学校主动寻求市场机制经营的结果。

市场逻辑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居民对教育投资热情高涨、政府对高中教育投入不足和管制放松。研究表明:1998年-2008年,我国高中阶段的教育经费投入占全部教育经费投入的比例从21.41%下降到2008年的18.29%。1998年,普通高中生均学费占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比例为7.57%,2002年提高到11.65%,然后持续下降,2008年降为8.17%。1998年,普通高中学费占农民人均收入的比例为19%,到2003年提高到37.5%,然后,持续下降,到2008年降为27.09%。^[13]可见,政府投入明显不足,而居民的可支付能力不断增强。在经济不太发达的衡水市、黄冈市、毛坦厂镇,有相当一部分家境一般甚至贫寒学生群体,在进入名校的机会减少、上升通道并不通畅的现实面前,他们不顾外界的聒噪,毅然决然选择“看得见的好处”——通过“苦读”取得好的高考成绩改变命运,这就是农村学生市场逻辑。

市场逻辑是政府在教育投入不足情况下普通高中办学方式转型的推动力量。不断扩大学校规模、提高学费标准、吸收民间资本成为超级中学发展的经济动因。如由于地方财政有限,衡水中学在政府后续投入没有跟上,出现了巨大的办学资金缺口情况下,为了解决办学经费不足的问题,采取了向银行贷款、扩大招生规模、名校办民校等措施。超级中学的发展大多呈现出“贷款建校园、招生还贷款、质量保生源”的状态。这无疑是成本一效益的意识在办学中发挥了作用。

市场逻辑对学校管理影响同样也是基础性的。20世纪80年代,黄冈中学教师工资在当地处于中上水平,吸引了大批优秀教师;而从90年代开始,一方面是学校花800万元买下50亩的造纸厂,加上2004年建设新校区,让该校背上了1亿多元的债务,老师的待遇开始急转而下;另一方面,南方城市的高薪招聘和自己现有工资的落差使许多优秀教师产生了动摇,他们选择了东南飞或去了武汉等大城市。市场经济的冲击,对黄冈中学这所相对封闭的山区中学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而经济激励和奖励机制则成为衡水中学娴熟运用并取得显著成效的管理手

段。如为了吸引优秀教师,衡水中学不惜重金招聘教师;为了留住优秀教师,该校舍得投入改善教师的生活条件(如办幼儿园、教师餐厅)、送教师学习培训、支付教师高工资(超出当地高中教师平均工资1倍以上)、频繁奖励优秀教师,也舍得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和环境。而支撑这些的经费主要是非政府投入。

当然,政府发展重点高中遵循了经济逻辑。追求“效益最大化”往往是地方政府发展教育的主要动力。政绩冲动使其更乐于优先扶植重点学校,因为相比一般学校,扩大重点学校的规模将会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地树立典型,彰显地方政府发展教育事业的政绩;除了“节约”教育支出以外,政府还能在学费、赞助费、学校基建等方面获得更多收入。同时,家长的择校行为抬高了重点学校周围的房地产价格。说到底,近年大量出现的“巨型学校”“超大规模学校”,均与利益机制驱使下的政府推动、名校谋利有关。^[14]尽管有许多违规的做法,作为超级中学而言,完全有办法让管理部门抓不到证据,甚至不排除用高升学率来要挟主管部门,让其不得不“视而不见”。

当然,利用市场机制也是政府对高中教育治理的一种顺势而为。因为基础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高中教育的投资主体是地方政府。由于义务教育属于基础教育的“重中之重”,地方有限的财力首先要保证免费义务教育的实施,客观上减少了高中教育投入。随着办学行为的逐步规范,普通高中招收“三限生”政策的逐步退出,经费短缺的态势进一步加剧。尤其是在一些贫困县,政府甚至无力给高中教育任何的经费投入,造成高中特别是农村高中负债严重。据调查,目前,全国普通高中负债规模已达1600多亿元。^[15]“吃饭靠财政、运转靠收费、建设靠贷款”成为大多数高中的常态,经费短缺成为制约普通高中发展的一大瓶颈。许多公立高中,被迫寻求市场谋发展,如扩大计划外招生、民办分校、收取参观费等;政府也鼓励发展民办高中,如2005年以来,黄冈中学与各地政府部门和企业合作,成立了4所分校:黄冈中学惠州学校、北京市华侨城黄冈中学、黄冈中学广州学校、黄冈中学第五师分校;2006年,毛坦厂中学与汇文中学、部分民间资本共同投资兴办金安中学和金安中学补习中心(民办

中学和培训机构);2013年,衡水中学与河北泰华锦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衡水第一中学(民办学校)。

不难看出,市场逻辑是在中国社会经济市场化转型后,普通高中教育发展的一种基本逻辑。这一机制导致了高中教育价格的波动,引发了更激烈的升学竞争,打破了区域教育平衡,扩大了重点高中与非重点高中之间的差距。如果政府不干预,就会造成恶性竞争,就会产生违规招生、扩大班额、压缩教师编制等投机或腐败行为,破坏基础教育阶段学校发展的生态平衡,许多对衡中的指责都来自其竞争对手。这正是市场机制失灵的地方,也可能是高中教育发展的必经阶段。

(三)文化逻辑:尊师重教的文化传统与追求卓越的学校文化交融

良好的文化环境是教育快速发展的适宜土壤,追求优质与卓越是“超级中学”的内在动力。文化作为一种资本要素,不仅具有功利价值,更具有精神和社会价值。其中,办学的核心理念,是一种对办什么样的学校、怎样办好学校的哲学思考,是学校发展的灵魂所在,也是校长办学的行动指南。

首先,超级中学具有肥沃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超级中学”现象一般出现在文化气息浓厚、商业氛围相对较差的农村地区和城镇。“上大学”“上好大学”已成为中国家庭的支配性观念;“要跳出农门,就要付出更多”的观念已深入人心。通过苦读改变个人和家庭命运的愿望,农村学生更强烈。很多“超级中学”的家长认为,送孩子读书,不一定非要考上北大、清华,孩子上个二本、三本就很好了;即使就业率不乐观,多读书、多学本事总是好的、有用的。这也是为什么家长千方百计想把孩子送到“超级中学”读书的根本原因。超级中学品牌的文化效应已经扩散到当地的初中、小学乃至幼儿园。

其次,超级中学具有文化自觉与自信意识。学校所在地产生过历史名人,名人效应催发其文化自觉。黄冈中学具有100多年的办学历史,产生过许多历史名人,形成了“黄高精神”——奉献、博爱、自立、自强^[16]。毛坦厂中学具有70多年的办学历史,校园经安徽工业大学设计院设计,布局合理,环境优美,

文化设施基础良好。衡水中学具有60多年的办学历史,其升学率已连续16年高居河北省第一;衡水一中校园由同济大学建筑系专家精心设计,典雅、大气,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理念。这些学校都把学校的历史名人和每年高考优秀学生的事迹作为下一届学生的励志榜样。如衡水中学的状元墙、班级口号、学校宣传橱窗、楼道的名人名言、校园的石刻、文化景观设计,到处弥漫着“勤奋学习”“争创第一”的文化氛围。而在与校长、年级组长、教师和学生的交谈中,他们都流露出“逢奖必夺”的气势、“争夺第一”的自豪和强烈的进取精神。

校长的先进办学思想是学校文化创新的源头。如衡水中学原校长李金池,1996年提出要改变“时间加汗水”的办学模式,进行课堂改革,向改革要成绩。他在深入研究教学思想、教育观念的基础上,从听课开始,引导教师反思,学校很快就从高效教学中收获到丰硕的成果,开启了追求卓越的文化之路。沿着这条路,衡水中学校长张文茂一直潜心钻研教育教学工作,带头科研,并通过科研促进有效教学、提高管理绩效、提升学校的社会影响力,使科研成为超级中学的活力之源。

(四)高中教育逻辑: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模式的冲突与协调

高中教育发展方式和水平与对其性质认识和目标定位相关。从普通高中性质看,既具有公益性和公共性,也具有私益性和选择性。因为高中教育既是基础教育的高级阶段,又是高等教育的基础,在整个教育系统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尽管高中教育属于基础教育,但高中教育决不是义务教育的延伸,高中教育不能像义务教育那样实行统一的“强迫教育”,不能回避大众与精英、基础与分流、规范与选择等两难问题,它需要体现其独立的价值^[7]。

长期以来,升学成为高中教育的主要目的。高中教育等同于精英教育,选拔是其主要功能。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高中教育普及化程度不断提高,高中教育的“公共性”被广泛认同。公共性、公益性价值主导下的高中教育模式,需要由政府举办或购买教育服务,促进区域高中教育均衡发展,维护高中教育的公平,不容许高收费、办重点高中。尽管有政府

的倡导和学者的呼吁,尽管有许多城市率先进行了高中的素质教育试点改革,但农村高中的精英教育模式仍然顽固地保持惯性,高升学率仍然是人民满意的教育评价标准。“黄高”“衡中”都被视为精英教育的典范。每年数以万计的教师趋之若鹜地从全国各地赶往黄冈、衡中学习取经,都是抱着“提高升学率”的美好期望而来的;而超级中学异地办分校,就是试图复制其高升学模式。

究其原因,尽管有的学者在学理上论证了公益性与营利性并非必然对立,但在现实中,人们仍将公共性与非营利性、公平性、公益性关联在一起。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之中,高中教育应该由国家负责提供,具有非营利性。人们在评价上明显存在公私对立的二元思维取向。把面向全体的素质教育看成是公正的、理想的高中教育模式,而把重视竞争、考试的选拔性教育称之为应试教育、落后教育。是面向全体还是面向少数,是扎扎实实的素质教育还是名副其实的应试教育,是开放式的人文化管理还是封闭式军事化管理,成为区分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的主要标准。人们对超级中学的评价正是基于这些标准,如“湖北黄冈中学辉煌不再,近14年来未出过省状元”^[18];再如对衡中是“高考集中营”、“高考工厂”、“魔鬼式训练”的指责,不过是人们不满升学竞争残酷的一种情感表达。

如何将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两种教育模式统一起来?目前,由于高考自主权的扩大、加分政策逐步取消,特别是教育公平观念的强化,精英教育模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即从关注少数尖子学生到关注全体学生;从关注学生的考试成绩到关注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学习品质、人格养成、个性发展;从被动的考试训练到促进学生主动的学习;从强调竞争到强调合作意识、团队精神、集体荣誉和师生共同成长。衡水中学、黄冈中学、毛坦厂中学正在探索一条兼顾升学和学生全面发展的道路,基本策略是通过宣传吸引或招生政策保证优质生源、想方设法留住优秀教师;同时进行更加精细化、人性化的管理改革、更高效的课堂教学改革。

总的来看,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模式评价背后是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思想的斗争。处于舆论旋涡

中的黄冈中学^[19],集中反映了这两种思想的交锋。以升学率作为高中发展的价值定位是精英教育思维模式的产物,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是“超级中学”合法性的前提;但在普及化背景下,以高升学率作为普通高中的唯一评价标准,就不符合时代的要求,“超级中学”出现了存在价值危机。我们认为,既不能将应试教育与精英教育对立,也不能将素质教育与大众教育等同。尽管完善的、精细化管理制度带来了高升学率结果,但并不意味着它是合理、合法的。

(五)学校组织逻辑:适应与超越战略下的学校组织再造

学校组织再造是指重新设计学校行政架构、权力架构和文化观念,使学校组织能够适应社会变迁需求,提高其管理效能,以达成教育目标。具体包含学校组织调整、学校工作流程的重新调整和教育消费者导向的思考。学校组织再造不只是改变组织结构或权力结构,更涉及教职工深层意识形态的转化与心智模式的改变^[20]。

面对内外压力,黄冈中学、毛坦厂中学与衡水中学都试图改变已有的办学方式和教育模式,如调整班子成员、加强教研组力量、增加学生社团活动、改善教师的待遇与生活条件等。比较而言,衡水中学的改革更彻底、更完善一些,具有超越性质,而黄冈中学和毛坦厂中学的组织变革更多的是一种适应性调整。

从衡水中学的组织发展过程来看,经历了规模扩张、升学率提升的组织外部适应阶段和以超越为目标进行学校组织再造的创新阶段。前一个阶段是以政策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组织变革,学校根据其外部环境(城镇化、高校扩招、高中示范中学评比、学校布局结构调整、提高地方基础教育发展水平、扩大高中阶段教育的普及率等)和内部环境(学校办学条件跟不上、由于学生人数扩张导致的管理难度加大等)的变化,有目的、有计划地改变学校组织的内在结构(年级组、科研结构、学生社团等)、行为(学生学习习惯、教师团队学习、师带徒、持续科研等)和技术(学习模式、德育模式、教学模式、管理模式、科研模式等)等,从而适应了高中教育普及化的客观需要,保持了学校的高升学率,维护了学校良好声誉。在升学率连续多年稳居河北省第一后,外在在舆论压

力下,学校开始探索自主创新之路,即以学校卓越发展愿景为主导的自下而上的学校组织变革。以主动发展,提高适应环境、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应变能力。其主要做法有:第一,确定了“追求卓越”的组织发展战略目标;第二,逐步形成了刚柔相济的组织制度;第三,开展了扁平化的级部制管理探索;第四,形成了促进教师专业化的校本培训制度;第五,科研成为学校发展的重要动力。张文茂校长谈治校理念时说:“正是得益于对‘立德树人、全面优质、追求卓越、和谐发展’办学方针的贯彻落实,才开创了衡水齐头并进、遍地开花的大好局面。”

三、治理“超级中学”现象的对策思考

“超级中学”现象是高中普及化阶段多样化办学的组成部分:在办学体制上它提供了“公私混合”的形式,在办学模式上它试图在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之间寻求协同,在管理模式上积极探索精细化管理与人性化管理融合。多重制度逻辑的动态制约,使“超级中学”逐渐形成稳定的制度模式。我们认为:“超级中学”现象有合理性、必然性,但不是一种很正常、健康的现象;“超级中学”现象产生具有复杂的制度背景和广泛的社会原因,需认真研究;对其不宜过多干预但需适当引导等。因为制度逻辑的形成是“集体行为”,单方面的改变很难成功^[21]。未来发展同样取决于这些逻辑的相互作用,以及受这些逻辑限制的相关行动方的互动。

(一)开展深入调查研究和专题研讨,客观评价“超级中学”的功与过

如何评价超级中学应该以是否满足社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求为标准。高中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就是家长与学生。调查表明,超级中学大多数家长与学生对学校是感恩的、满意的。教育主管部门应对“超级中学”现象进行专门研究,把握“超级中学”现象的复杂性质。在坚持正确教育价值导向同时,平衡各方面利益诉求,而不是简单地批判或者赞扬。加强高中多元化发展政策的引导,避免与升学率挂钩的激励政策导致的恶性教育竞争和高中同质化。

1. 认识“超级中学”现象的角度:从关注结果到关注过程

当前,“超级中学”现象之所以引起学术界、媒体

的关注是因为“高考升学率很高”,学术界、媒体的争论主要围绕高考成绩展开。我们认为“高升学率”不当应当成为争论的焦点。如果照此逻辑,“高考成绩很差”的学校也应当成为关注的对象。应避免由于高升学率而“被神话”,升学率下降而“被黑化”的二元思维。关注高中教育的过程更为重要,关键要看是否尊重了教育规律和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研究者应深入这些学校的教育过程,探寻其高考成绩高的根源;不断探索其学生管理、教师培训、学校团队管理模式、高效教学等诸多方面与高考成绩之间的关系。

2. 研究“超级中学”现象治理的出发点:从行政思维到法治思维

目前关于“超级中学”现象的争论,秉承着“行政管理”导向开展,将超级中学现象视为一个“问题”;我们认为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黄冈中学本身是一种特色高中的类型,这些昔日应试教育“标杆”学校,经历了转型阵痛,办学经验值得认真总结。研究的出发点是弄清事实、总结经验,而非简单“治理”;应悬置管制意识,弄清“超级中学”是否存在科学有效的管理行为、是否有违规招生和违规收费等事实;更重要的是要认真反思高考制度改革、高中政策和地方政绩观问题。

3. 评价“超级中学”现象的方法:从单一的外部评价到内外部综合评价

评价“超级中学”现象不仅是一个客观地认识教育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主体想象和感受的过程,因此,“超级中学”现象研究应考虑不同利益主体的主观评价。

少数媒体炒作衡水中学高考“神话”,炒作黄冈中学从“辉煌”到“衰落”,走下“神坛”,跌入“低谷”,都是用高考状元或高升学率这一标准,是对其办学思想、办学理念、办学模式的不公正、不科学的评价,给社会和教育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需要加强舆论引导。

教师、家长和学生是超级中学教育的利益相关者,也是评价的主体。但在超级中学现象的争论中,缺少他们的观点。学者、媒体在评判超级中学现象时,应将他们的声音考虑在内。课题组调研统

计,被调查的10多位衡中教师均认为“师者父母心,衡中非监狱、非军营”;“在这里感觉很幸福”;访谈的10多位学生都认同教师陪伴教育的作用;家长问卷中,有96.5%的家长对衡中教育感到满意,88%的家长表示“如果再有机会,肯定还会让孩子选择衡水中学”。可见,评价“超级中学”现象的指标不仅仅依靠客观的教育结果,也要充分体现师生的主观感知质量。

(二)以创新精神、法治思维深化高中教育改革

“超级中学”现象是现行教育制度催生的结果,是区域教育生态的必然产物,并呈现出集聚效应。治理“超级中学”现象,是一个系统工程,绝非针对一所学校就能达到目的,只有用法治思维和创新精神,从区域教育生态的治理入手,进行制度创新,才能标本兼治。建议开展超级中学治理的省级试点。第一,合理调整高中的布局结构,逐步形成普高和职高的合理比例结构。第二,改革考试招生制度,大力改进招生计划分配方式,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确实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第三,制定特色高中国家标准,鼓励真正有特色中学有序扩张。第四,依法治校。调整或落实已有的政策;制定最低生均面积、最高师生比,规范学校规模和班级规模,保证学生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建立名校与分校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规范,保护名校的合法利益;探索混合式办学体制的管理规范,避免一些名校借建分校、挂招牌等手段扩大招生变相敛财。第五,派驻学监,加强监督和指导,对办学中可量化、可操作部分进行严格监控。对高收费、招收异地学生、提前录取、提前考试、提前开学、阻止中考、隐瞒成绩等问题要重点监控,对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进行持续监测。

(三)尊重办学自主权,促进普通高中特色发展

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尊重超级中学办学自主权,充分肯定其改革成果。同时,还要为其提供更多更专业的服务。首先,帮助学校完善教育理念。潜能激发不能演变为洗脑,警惕通过极端生活突破心理和生理极限的弊端;精细管理不能过头。其次,帮助总结经验,防止其他学校跟风,简单模仿。最后,规范各地政府与教育部门的行为,促进先进的教育思

想、管理经验的输出。避免以“实验”之名,行“特殊”照顾之实,以抓经济的方式办教育。

(四)加强对超级中学舆情分析和引导

“超级中学”现象争论的本质是教育思想的冲突和交锋。各种舆论反映了不同群体的教育评价观和利益观。现阶段,许多媒体为吸引眼球、放大教育的新闻效应,已经把超级中学妖魔化;许多专家没有深入调查研究,凭空想象,滥发议论;一些超级中学宣传渠道单一、片面夸大高考成绩;一些政府或教育管理部门领导有选择性地宣传某些学校的成绩,以致造成社会误解,造成学校和教育的信任危机。为此,建议教育主管部门首先要有教育舆论建设的意识,正确认识与对待媒体对教育问题的报道,改变单一的宣传学校升学成绩的做法。其次,提高教育舆论建设能力。要把整个教育战线的热点、焦点或者有可能成为热点的教育盲点问题纳入宣传与舆论建设的工作规划之中,建设整个系统的宣传、舆论以及教育危机把控与处理能力。最后,还要培养超级中学校长的舆论素养,增强其舆论把控能力,让社会舆论成为教育健康发展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 [1]冯帮,李紫玲.从“超级中学”现象看城乡子女教育公平问题——以湖北省D市为例[J].教育发展研究,2014,(2):67-75.
- [2]习勇生.“超级中学”:普通高中校际差距的催化剂[J].中国教育月刊,2014,(6):15-18.
- [3]谢春风.我国中小学名校巨型化倾向的理性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12,(15/16):78-83.
- [4]李斌.衡水中学到底哪里不正常[N].中国青年报,2014-10-23(3).
- [5]杨海燕.超大规模学校的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J].教育发展研究,2007,(9A):8-14.
- [6]叶水涛.事实与价值:衡水中学的是是非非[J].中国教育

学刊,2015,(5):1-7,12.

- [7]叶水涛.不要再妖魔化衡水中学[N].中国青年报,2014-10-23(3).
- [8]褚清源.衡水中学惹谁了[N].中国青年报,2014-11-11(3).
- [9]蔡如鹏.高考状元与复读利益链[J].中国新闻周刊,2015,(35):55-57.
- [10]刘万永.素质教育一样有高升学率[N].中国青年报,2001-10-23(3);杨占苍.素质教育更能提高“升学率”[N].中国教育报,2002-09-21(3);杨占苍.素质教育与“升学率”并行不悖[N].中国教育报,2002-10-11(3);柴葳.素质教育不排斥升学率[N].中国教育报,2004-12-05(3);乾羽.没有升学率,素质教育意义何在[N].中国青年报,2009-11-05(3).
- [11]李汉林,渠敬东,夏传玲,陈华珊.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5,(1):94-108.
- [12]周雪光,艾云.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一个分析框架[J].中国社会科学,2010,(4):132-150.
- [13]沈百福.我国高中阶段教育经费投入分析[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1,(11):16-20.
- [14]姚继军,陈婷婷.超大规模学校的问题分析与改革出路[J].人民教育,2014,(4):30-34.
- [15]张珊珊,汪明.寻求突破:普通高中发展亟待解决三大问题[J].中小学管理,2015,(3):18-20.
- [16]张大敏.还原一个真实的黄冈中学[EB/OL].<http://www.hgiti.com/news/hgxw/21354.html>,2015-05-08.
- [17]霍益萍,黄向阳,李家成.多样、开放、灵活:普通高中教育体系的构建[J].教育发展研究,2009,(18):15-18.
- [18]黄敏.黄冈教育跌下神坛的诱因[N].长江商报,2015-04-06(B2).
- [19]刘博智.舆论旋涡中的黄冈中学:神话已被贬成笑话[N].中国教育报,2015-05-07(5).
- [20]孟繁华.学校组织再造——对有效学校变革的思考[N].中国教育报,2008-04-19(3).
- [21]柯政.学校变革困难的新制度主义解释[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7,(1):42-54.